

王明蓀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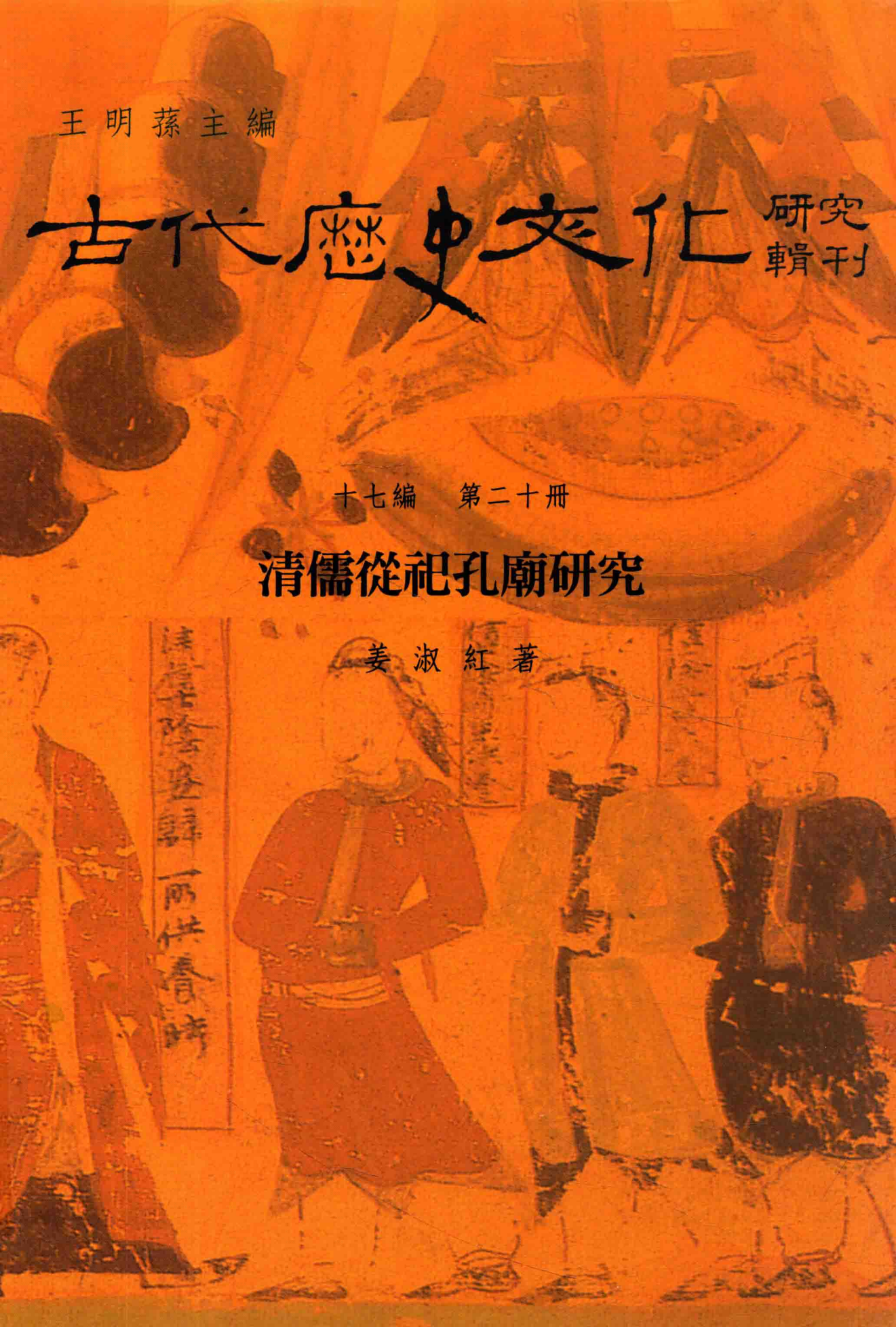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十七編 第二十冊

清儒從祀孔廟研究

姜淑紅著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十七編

王明蓀主編

第20冊

清儒從祀孔廟研究

姜淑紅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清儒從祀孔廟研究／姜淑紅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7〔民 106〕

序 2+ 目 4+208 面；19×26 公分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十七編；第 20 冊）

ISBN 978-986-404-960-8（精裝）

1. 孔廟

618

106001393

ISBN-978-986-404-960-8



9 789864 049608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十七編 第二十冊

ISBN：978-986-404-960-8

清儒從祀孔廟研究

作 者 姜淑紅

主 編 王明蓀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王筑 美術編輯 陳逸婷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7 年 3 月

全書字數 171169 字

定 價 十七編 34 冊（精裝）台幣 6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清儒從祀孔廟研究

姜淑紅 著

作者簡介

姜淑紅（1983～），女，漢族，山東濰坊人。2006 和 2009 年先後畢業於山東師範大學，獲歷史學學士與碩士學位，2012 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現任淄博職業學院稷下研究院業務部副主任，講師，主要致力於近代文化和齊文化的相關研究。曾參與編寫《民國思想文叢》，並擔任《現代評論派、新月人權派》一卷的主編。在《學習與實踐》、《學術論壇》、《船山學刊》、《江南大學學報》等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多篇。

提 要

隨著儒學地位的提高，孔廟逐漸由私廟發展成為官廟。「廟學合一」制形成後，孔廟既是國家祭祀的禮儀性建築，又成了國家推行政教措施的象徵，具備了政治與文化的雙重功能。歷代統治者通過在孔廟中舉行的祭孔儀式，強化了儒家的獨尊性和神聖性。統治者還利用掌握孔廟從祀人選的決定權，引導儒生言論，制約儒學發展方向，並將儒家理念滲透到具體社會生活中，從而保障「治統」的穩定性。

歷代統治者對孔廟從祀都非常重視，清軍入關並確立在全國的統治後，為化解因長期對抗造成的精神緊張，盡快恢復社會基本倫理秩序，在為孔子上尊號的同時，不斷增加從祀人員。在清代的孔廟從祀中，清儒從祀尤為重要，與清代的文化政策聯繫最為密切。雍正時期實行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反映在孔廟從祀上，便是批准多位理學名儒從祀孔廟。雍正還首開從祀本朝理學名儒的先例，將陸隴其推上孔子廟堂。

乾嘉時期漢學鼎盛，程朱理學雖高居廟堂，卻趨於衰退。道光以後，清統治者出於挽救危局的需要，繼續提倡和強化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採取了一些提高理學地位的措施，如從祀清代理學名儒。在統治者政策支持下，相繼有陸隴其、孫奇逢、張履祥等清代理學大儒登上孔子廟堂。孫奇逢從祀孔廟，反映了道光年間「真理學」興起和漢宋趨於調和的社會思潮。張履祥從祀，是在其理學名儒形象逐漸被社會認可的基礎上，在國家急於推崇「正學」以加強象徵權威的背景下，通過浙江官紳的不懈努力，最後取得成功。光緒末年，顧、黃、王三大儒從祀孔廟，則是特定時代背景下清廷的非常之舉。清廷允准三大儒從祀，主要是因為三大儒學說既合乎時代變革，又不離乎中國固有的經史之學，能滿足清政府在新政時期既要求變革又要守住國粹進而穩定統治的願望。

總之，清儒從祀作為清統治者文化政策的重要內容，既能反映清代文化政策之演變，又能體現不同時期社會思潮的變化，與清代社會變遷之大勢緊密相連。

《清儒從祀孔廟研究》序

在中國悠久的歷史傳統中，祭祀是頭等大事之一，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就政權而言，祭祀乃強化「君權神授」之舉，是維繫統治的重要手段；就民間而言，祭祀是與先祖溝通以維護家族、宗族一體的重要方式。在諸多名目、種類的祭祀中，祭孔為官方、民間所共同關注，成為一代盛典。起初，對於先師孔子的祭祀為私人行為，祭祀的場所孔廟只是一所家廟，到兩漢時孔廟才具備官廟性質，成為官方祭祀孔子，對儒學表示尊重的象徵性建築。孔廟從祀開始於東漢之時，唐代起發展為包含「配享」與「從祀」的完整附祭制度，從祀者則為孔子弟子及對儒學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的後世儒者。

歷朝歷代的孔廟從祀現象，應該引起學界的充分注意，因考察孔廟從祀的制度、歷程、從祀者身份等命題，無異於從一個特殊的角度考察一部儒學發展史。在各個朝代中，清代的孔廟從祀現象尤應得到關注。作為中國最後一個王朝而且是少數民族統治的王朝，清朝的孔廟從祀具有鮮明的民族、時代特色，其政治、社會功能發揮得也很充分，非常值得學界深入研討。但遺憾的是，目前對這一題目的研究還頗為有限。此一情形下，這部《清儒從祀孔廟研究》的問世，很令人高興。

《清儒從祀孔廟研究》是作者姜淑紅在其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修改完善而成的一部專著。該書在系統梳理清代孔廟從祀之歷史進程的同時，以陸隴其、孫奇逢、張履祥以及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大儒從祀孔廟為個案，具體分析了清儒從祀孔廟的各個歷史側面，使讀者由此知曉了一部獨特的清代儒學史。全書緊緊抓住了有清一代的時代特色——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以及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以此作為大的背景，書寫清儒從祀孔廟的特定

歷史。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特色，使得清廷一向對於「夷夏之辨」這樣的命題很敏感，一再強調「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注重掌控意識形態話語權，把理學作為重要統治工具，強大理學家的官方色彩。通過把理學大儒陸隴其、孫奇逢、張履祥等人從祀孔廟，清廷抬升了本朝理學家的地位，使其神聖化，從而對讀書人起到表率作用，發揮強大的政治功能。至於晚清之時所遭逢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即西方殖民勢力東來所導致的「天崩地解」的大變化，則是歷代王朝所無而需清廷面對的嶄新局面。為了應對世變，清廷只得搬出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大儒，將之塑造為既能維護傳統又合乎時代變革要求的新偶像，清季新政之時讓三大儒從祀孔廟，藉此宣示朝廷立憲的誠意，實質上仍為維持專制統治服務。此種用心被有識之士識破，章太炎等人指出此為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倒退行為，無法挽救清王朝衰亡的歷史命運。綜觀全書，可以說，如此的敘述和論析，是基於史實的嚴密探討，合於學理又有深度。

作為學界首部全面研究清儒從祀孔廟現象的學術專著，該書可謂是對學術研究薄弱環節的一個彌補，創新性強，而且內容充實，個案鮮明，說理充分，敘述得當。不過儘管如此，瑕不掩瑜，該書的個別論述還是有再討論的空間的，相信作者一定會在未來的研究中予以完善。

是為序。

李 帆

2016年12月15日於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



目

次

序 李 帆

緒 論 1

一、選題緣起與意義 1

二、學術史回顧 3

三、研究範圍與思路 8

第一章 孔廟從祀的變遷 9

一、祭祀與孔廟 9

（一）祭祀起源和祭祀種類 9

（二）廟學合一 11

二、清代以前的孔廟從祀 16

三、清代的孔廟從祀 20

（一）清前中期的孔廟從祀 20

1、「崇儒重道」的基本國策 20

2、雍正更定孔廟祀典 23

3、乾隆時期的孔廟從祀 26

（二）晚清時期的孔廟從祀 28

1、孔廟從祀與「扶持名教」 28

2、從祀歷史名臣 29

3、從祀理學名儒 30

小 結 32

第二章 陸隴其從祀孔廟	35
一、清初實學思潮與王學命運	36
二、與呂留良共力發明宋學	37
三、「尊朱黜王」	40
(一)「黜王」不遺餘力	40
(二)一以朱子爲尊	42
四、身後奉祀	44
(一)鄉賢祠、名宦祠奉祀	44
(二)鴛湖書院祠堂奉祀	46
五、張伯行對陸隴其的推尊	48
六、登上孔子廟堂	50
小 結	52
第三章 孫奇逢從祀孔廟	55
一、開山立派之雄風	56
(一)會通朱王	56
(二)學以致用	57
二、湯斌傳師道，揚師名	59
(一)仰止夏峰，泰山喬嶽	60
(二)理學之大宗	62
三、夏峰北學形成	63
四、後世官紳奉祀	65
五、「晦而不彰」到躋身孔廟	67
(一)請祀湯斌未果：理學轉衰	67
(二)從祀機緣天鑄造	69
(三)「慎獨存誠」享孔廟	73
小 結	76
第四章 張履祥從祀孔廟	79
一、平民儒士的耕讀生活	80
(一)貧而不改其志	80
(二)由王返朱、耕讀相兼	83
二、身後命運逆轉	85
(一)開始得到本地官方承認	86
(二)朱坤請祀未果	87

(三) 蘇惇元搜集遺著，謀求請祀	90
三、同治年間從祀成功	93
(一) 從祀的社會環境	93
(二) 浙江官紳對張履祥的推崇	97
(三) 躋身孔廟	102
小 結	104
第五章 顧、黃、王三大儒從祀孔廟	107
一、京師士大夫與顧祠會祭	107
二、湖湘士人與王夫之形象的放大	109
(一) 理學經世名儒	110
(二) 新學變法先驅	114
三、三大儒從祀孔廟的曲折歷程	118
(一) 王夫之從祀孔廟的歷程	118
(二) 陳寶琛奏請顧、黃從祀引發爭議	124
(三) 趙啓霖奏請三大儒從祀成功	130
四、三大儒從祀孔廟的政治與學術意蘊	132
(一) 趙啓霖奏請三大儒從祀的學術環境	132
(二) 三大儒從祀與立憲之爭	136
(三) 從祀的社會反響	140
小 結	142
結 語	145
附錄一 清末孔廟之命運	149
附錄二 清代孔廟新增先賢先儒從祀一覽表	161
附錄三 歷代尊孔紀略	165
附錄四 相關發表文章	171
參考文獻	197
後 記	207

緒 論

一、選題緣起與意義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作為維繫政權的精神力量，重要性超過「戎」，說明祭祀典禮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地位極為重要。古代統治者無不相信「君權神授」，並對應以神道設教，祭祀不僅是人神溝通的手段，還成了身份的象徵，政治意義愈加濃厚。古代祭祀種類名目繁多，如祭祀山川、河流，祭祀風、雨、雷、電，祭祀祖先、先師孔子等。祭祀山川、河流等是統治者專享的政治權力，祭祀祖先則是普通百姓可享之權，而對先師孔子的祭祀經歷了從私人祭祀到國家祭祀的演變過程。隨著儒學地位的提高，祭孔逐漸成為國家祭祀的重要內容，屬於祭孔體系的孔廟從祀也愈來愈為統治者所看重。

孔廟從祀，意在「佐其師，衍斯世之道統」，奉祀的對象是歷代儒家正統的繼承者。歷代儒者，因對「道統」的理解分歧，導致從祀標準變異紛紛，歷代從祀人選標準隨儒家思想脈動而有所變遷。因此，從歷代從祀人選上可窺見一代儒學主流思想。孔廟祭祀終究是官方祭典，儒者本身無法決定從祀人選，只有朝廷才可以「進退諸儒」。由此，孔廟從祀不僅可以反映儒學主流思想，亦可以窺見政治風嚮之變動，從而理解朝廷代表的「政統」與從祀代表的「道統」之間的關係。

孔廟從祀，自東漢開創，唐貞觀年間成為定制，此後歷代沿襲。滿族統治者入關後，更將該制度發揮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順治二年（1645），順治帝為孔子上尊號「大成至聖文宣先師」，承舊例在孔廟大成殿中以「四聖」和「十哲」配饗，以先賢六十九人和先儒二十八人從祀兩廡。康熙五十一年（1712）

和乾隆二年（1737），朱子和有子從先賢升為先哲，大成殿「十二哲」最終定型。雍正二年（1724）更定孔廟祀典，復祀六人，增祀二十人，為唐代以後規模最大的增祀舉動。降至晚清，統治者更是大肆增加孔廟從祀者，從道光二年（1822）劉宗周從祀，迄宣統三年（1911）劉因從祀為止，三十一位先儒添列孔子廟庭。

清代孔廟從祀，只有增加、復祀而無罷黜的例子，這點最為清統治者引以為豪。清廷雖是外來政權，對儒家文化的利用卻頗為嫻熟。清初君主不斷提升祭孔禮儀，康熙曾親赴曲阜拜祭孔子並三跪九拜，將御用曲柄黃蓋留供孔廟，以表示莫大的尊崇。雍正四年（1726）八月仲丁，雍正帝親詣釋奠，開清帝春秋二祀親祭之先河，以後漸漸成為定制。乾隆二年（1737）上丁，乾隆帝在京師孔廟大成殿行三獻禮，從此，清帝親自到國子監孔廟行釋奠三獻禮成為「恒式」。光緒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以「孔子至聖，德配天地，萬世師表」，升為大祀，祭孔成為國家祭祀的最高禮儀。清帝尊崇孔子，是要藉此以證明自身統治的合法性和正統性，不斷增加孔廟從祀，則是力圖達到將「道統」與「治統」合二為一的目的。

清初統治者通過尊崇孔子，重用理學名臣，從祀理學名儒等方式實現了「治統」與「道統」的合一。一方面，清初話語權力開始轉向，使得自宋朝以後知識分子用「道統」來牽制皇權的話語權喪失，變為專制權力的附庸。另一方面，「治教合一」本就是儒家知識分子的理想追求，清初統治者積極塑造自己的「道統」形象，反過來亦有利於士人引導帝王接受儒家道統理念，從而借皇權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得以實現理想訴求。

陸隴其從祀孔廟正是清初統治者建立「治統」、「道統」合一形象的重要舉措。雍正同意從祀陸隴其，一方面是表他重建清初理學道統之功。另一方面通過塑造理學偶像，實施「以漢御漢」的政治策略。實際上仍遵循了傳統的「聖人之道」與「帝王之道」聯姻的政治軌道，以此來穩固統治根基。

晚清時期，內憂外患，清政府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統治危機。內部政治腐敗，經濟衰退，反抗鬥爭不斷；外部列強危逼，瓜分土地，討要賠款，割去主權。這些令統治者焦慮不已。內安民心、外禦強敵，成為時代課題，清朝統治者被迫順應時代潮流，一步步推行改革。在改革浪潮中，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和民權思想相衍而生，清朝的官方意識形態面臨巨大挑戰。為了維護儒學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保持「治統」和「道統」的合一，清政府對統治政

策做出了一定的調整。

增加孔廟從祀人數，允許眾多本朝理學名儒從祀孔廟，成為統治者調整統治政策的主要手段。釋放的政治信號主要有以下兩點：

第一，孫奇逢和張履祥從祀孔廟，象徵著理學經世精神的恢復和闡揚。道光年間，有識之士繼承並發揚明清之際講求「經世致用」的傳統，反對脫離實際，反對崇尚空疏，注意研究現實問題，經世思潮再興。孫奇逢因為治學不分門戶，講求實際，符合時代潮流和統治需要而被不失時機地推上了孔子廟堂。

張履祥從祀孔廟是在太平天國起義打亂清政府統治秩序之後，清鎮府反思並調整文化政策的結果。面對混亂局勢，如何盡快穩定人心，鞏固清政府統治大廈，成為統治者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從祀張履祥，樹立正學偶像，發揚經世理學，挽救文化危機，進而鞏固統治。

第二，光緒三十四年（1908），顧、黃、王三大儒從祀孔廟成功，反映了「理學經世」向「中體西用」政策的調整。三大儒中王夫之成名最晚，其形象放大過程，反映了湖湘士人提升本地文化影響力和塑造理學經世名儒以砥礪士風的雙重訴求。顧炎武早在清初就已名聲在外，到晚清時期，由於後世學人舉行的顧祠會祭活動而獲得經久不衰的影響力。

總之，三大儒從祀歷程漫長而曲折，如果將之比作一場舞臺劇，劇情可謂撲朔迷離。交織著各個政治派別、學術派別的複雜爭論。最後，三大儒被允許一起從祀孔廟，則是非常態下的非常之舉，當權者為了推動立憲順利進行，又能保證立憲在意識形態軌道下運行，而將三大儒一併推上孔廟。三大儒被塑造成了即能保存國粹，維護「中體」，又有利於新政推行，有利於改革的模範形象。然而，在清政府統治效能下降的情勢下，此種無奈之舉更顯無力，反而引起社會爭議。

筆者在考察清儒陸隴其、孫奇逢、張履祥和顧、黃、王三大儒從祀孔廟歷程的基礎上，試圖體現清代不同時期的文化政策和社會思潮的變化。

二、學術史回顧

目前為止，關於孔廟的研究成果比較可觀。多從孔廟建築、孔廟功能以及祭孔沿革、祭孔禮儀等角度展開研究。專著有劉亞偉《運去的歷史場景：祀孔大典與孔廟》，該書從孔廟建築、祭孔由來、祭孔禮品、祭孔禮仗等諸

多方面，論述了孔廟及孔廟祭祀的發展。〔註1〕語言平實，圖文並茂，內容豐富，不失為一本瞭解孔廟的入門性著作。張亞祥《江南文廟》，敘述孔廟的建築形制、各地孔廟的歷史、孔廟在近現代的衰落和復興等。〔註2〕學位論文有董喜寧《孔廟祭祀研究》，文章詳細考證了孔廟祭祀的整個過程，包括孔廟獻祭者、孔廟祭品與祭器、孔廟祭祀中的樂與舞、孔廟祭祀的釋奠程序等。〔註3〕以上研究成果對於了解孔廟行制、孔廟發展歷史以及孔廟象徵的多重功能具有重要意義。

需要特別指出，黃進興《權力與信仰：孔廟祭祀制度的形成》以紮實的文獻考證為基礎，剖析了孔廟祭祀制度在各朝各代的形成和發展，「自唐初以後成為國家祭祀要典，在此期間變化多端，起伏不定，其中權力與信仰的交互滲透，是孔廟祭祀發展的焦點問題。〔註4〕該文資料詳實，論證有力，對於理解孔廟從一家之私廟發展成國家之官廟，從偏居曲阜一地擴展至全國各地提供了很好的線索。

學界對孔廟從祀的相關問題關注尚且不多，最直接的整體研究成果當屬黃進興的《學術與信仰：論孔廟從祀制與儒家道統意識》，「從文化角度探討儒學主流思想如何透過道統意識來左右孔廟從祀制，並造成歷史上的諸多變遷」。〔註5〕文章側重梳理清代以前的孔廟從祀，對清代孔廟從祀著墨不多，而且由於是總體探討，對清儒從祀孔廟沒有展開論述和分析。

個案研究中對於顧、黃、王三大儒從祀孔廟關注較多。秦燕春《從邊緣到中心：三大家從祀兩廡始末考》一文梳理了顧、黃、王三大儒從祀孔廟的歷程。該文指出：「發生在晚清時期的『晚明三大家』的從祀問題，則又因為事關地方權力的擴張、全國各區域之間的文化競爭、傳統道學楷模的改寫以及學術新範式構建中時代變遷的回應等諸多因素，因而與歷代發生的從祀之爭議明顯區別開來，各種聲音競相喧嘩之時，尤其顯得風雲詭譎」。〔註6〕該

〔註1〕劉亞偉：《運去的歷史場景：祀孔大典與孔廟》，山東文藝出版社2009年。

〔註2〕張亞祥：《江南文廟》，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

〔註3〕董喜寧：《孔廟祭祀研究》，湖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

〔註4〕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40頁。

〔註5〕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86頁。

〔註6〕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84頁。

文重點論及光緒末年趙啓霖奏請三大儒從祀之後朝野「三教九流」的話語較量。

何冠彪《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入祀文廟始末》〔註7〕一文考證了三大儒名稱的由來，並梳理了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三大儒從祀孔廟的過程，對三大儒從祀引起的爭論也有涉及：「『清初三大儒』原為孫奇逢、李顥、黃宗羲的合成，但到了清末，則指黃宗羲、顧炎武和王夫之三人。黃、顧、王之所以在清末被稱為『清初三大儒』，實與他們同時入祀孔廟，得到官方認可的學術地位有莫大關係。……三人應否入祀的問題，在光緒朝有過激烈的論爭，前後共三十多年才有結果。其次，廷議在光緒末年引起在野學人的關注，並且加入評論」。〔註8〕

段志強碩士學位論文《舊廟新神：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從祀孔廟研究（1876～1908）》研究了顧、黃、王三儒從祀孔廟的歷程，側重研究三儒最後一次從祀孔廟爭論，將三儒從祀放諸清末預備立憲的時代背景下，認為三儒從祀的主要原因是「當局試圖以表彰他們來宣示立憲誠意，推進政治改革的進程」。〔註9〕

戶華為《晚清社會思想變遷與聖廡的最後演出——顧、黃、王三大儒從祀風波探析》一文分析了光緒末年圍繞三大儒從祀孔廟所引起的爭論。該文對爭論過程分析較多，主要展現統治集團內部圍繞黃宗羲應否從祀產生的駁黃派和主黃派的爭論，圍繞從祀這一事件，展現了「不同階層，權力集團之間以及同一陣營內部對傳統的不同詮釋與對象徵資源的爭奪」。〔註10〕

可見，顧、黃、王三大儒從祀孔廟因為過程曲折、凸顯的時代背景和學術意蘊尤為複雜，學界關注較多。但是仍有可繼續研究的空間，晚清以前尚默默無聞的王夫之如何走入士人視野？怎樣被不同利益集團塑造成不同形象？王夫之形象的放大與湖湘士人爭取地方話語權有怎樣的關係？湖湘士人

〔註7〕何冠彪：《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入祀文廟始末》，《明清人物與著述》，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6年版。

〔註8〕何冠彪：《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入祀文廟始末》，《明清人物與著述》，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6年版。

〔註9〕段志強：《舊廟新神：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從祀孔廟研究（1876～1908）》，清華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第16頁。

〔註10〕戶華為：《晚清社會思想變遷與聖廡的最後演出——顧、黃、王三大儒從祀風波探析》，《社會科學研究》2005年第2期。

在怎樣的背景下屢次爲王夫之請求從祀孔廟？朝野對王夫之形象的不同解讀在王夫之從祀孔廟過程中起了怎樣的作用？還有，三大儒被請求從祀孔廟之時的社會和學術環境如何？從祀孔廟成功之後引起了怎樣的社會反響？三大儒從祀體現的不同政治派別力量的角逐，三大儒形象在清末的塑造等等，都值得深入研究。

除三大儒從祀孔廟之外，關於清儒從祀孔廟研究尚有少量個案研究成果。戶華爲碩士學位論文《張履祥的思想實踐與「由凡入聖」的型塑歷程》〔註11〕從明清之際的特殊歷史場景入手，勾勒了平民儒士張履祥的真實生活情景，剖析了張履祥的耕讀觀、經營管理思想、治世思想的內涵與特徵及其與傳統的踐履概念和「耕讀傳家」的異同，並在此基礎上勾畫了張履祥由布衣儒士到地方偶像直至進入孔廟，成爲儒學典範的過程。該文論及張履祥從祀孔廟歷程，對以後相關研究有啓發作用，但還有深入研究的空間。比如浙江官紳雷鉉、朱坤、陳梓等人推崇張履祥及請祀活動，方東樹、蘇惇元師徒二人推崇張履祥及請求從祀孔廟活動，左宗棠、許瑤光等地方大員在其聲名擴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張履祥在怎樣的時代背景下被塑造成正學偶像，成爲地方士人激勵後人勸善向學、維護社會秩序的象徵資源。

清朝統治者從祀諸位本朝名儒，是要藉此以證明自身統治的合法性和正統性，並力圖實現「道統」與「治統」的合一。關於「治統」與「道統」合一之問題，學界相關研究成果主要有黃進興《清初政權意識形態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統觀》；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卷二；南開大學劉方玲的博士學位論文《清朝前期帝王道統形象的建立》等。

黃進興先生指出，「治教合一」雖爲儒家長遠以來的政治理想，但這個理想落實到制度結構上，卻是分而爲二，各由「統治者」和「士人階層」所承擔；宋代以降，「道統觀」逐漸發展成形，更賦予「士人」意理的基礎，倚之與政權抗衡。但在康熙皇帝的統治期間，由於「道統」和「治統」的結合，使得「治教合一」的象徵意義和結構上（皇權）真正化而爲一，致使士人失去批判政治權威的理論立足點。〔註12〕

〔註11〕 戶華爲：《張履祥的思想實踐與「由凡入聖」的型塑歷程》，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2年。

〔註12〕 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76頁。

劉方玲認為，「道統與治統合一（即君師合一）是歷史上儒家所建構的理想政治形態，儒家士大夫奉承這一理念，一方面以得君行道為職志，希圖與帝王共治天下，另一方面更希冀通過對帝王傳輸儒家的道統理念，來達到帝王兼具道統與治統合一的形象」。「但清朝前期帝王道統化的現實顯示，一旦帝王接受理學、獲得『道統』，他就可以宣佈士人『道』所用，也就是為皇帝所用。這樣，士階層就從自願作臣僕，進一步沉淪為必須做臣僕的悲慘境地。」〔註13〕

葛兆光先生從知識、思想與信仰角度探討了清初話語權力的轉移，他指出，「從順治、康熙到雍正，清王朝已經建立近百年（1644～1735），第一代經歷過明亡慘痛的士人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傅山、方以智、屈大均以及呂留良都陸續離開人世，對於明代王朝的依戀漸漸被淡忘，這個時候，人們的空間認同與種族認同，已經由漢族文明為中心的『大明帝國』擴展到了滿、蒙、漢共同體的『大清帝國』，所謂『中國』已經成了一種文明的意味而不再是種族的意味。於是，士大夫的責任又從維護種族尊嚴逐漸轉向了建設道德秩序。……所謂『聖學』，……通常，它是由所謂『道統』延續、由士大夫表述，有時是可以超越『正統』之上的真理，它常常是一種文化話語權力，所以，這裡還應當提到的是清初這種話語權力的轉移。……所謂『聖學』，或者叫『正學』、『理學』、『道學』，雖然它的解釋權力常常屬於士大夫知識階層，但是由於它的起點和終點都是確立秩序，所以，在皇權籠罩一切，政治高於一切的時代，有時也會被政治權力轉手接去，像清代初期的政治權力就相當巧妙地壟斷了本來由士人闡釋的真理，並使帝王的『治統』兼併了『道統』，使士人普遍處在『失語』的狀態」。葛兆光先生接著指出，他們用「治統」兼併道統的策略首先是重用或表彰所謂的理學名臣，陸隴其曾獲從祀孔廟兩廡，張伯行則被康熙、雍正兩朝推重。〔註14〕

總之，關於清儒從祀孔廟研究，直接研究成果較少，旁涉議題不少。本課題以清儒從祀孔廟為研究中心，借鑒、吸納、綜合上述研究成果，希圖開闢清代文化史研究的一個新角度和領域。

〔註13〕 劉方玲：《清朝前期帝王道統形象的建立》，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第279頁。

〔註14〕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508～509頁。